

不能被遗忘的青春

李慧玲

圆切线成立以来，对于应该只是进行小圈子研讨、议论，还是应该扩大范围，并且以不同形式来参与社会，社员之间一直有不同意见。有的社员认为应该有社会承担，普及用华文华语来探讨时事、国家长远发展课题的主张；有的认为志同道合者小圈子讨论无可厚非。我们在没有面红耳赤、掀桌翻椅的情况下决定做一次既延续自己，又有别于过去的活动。

延续自己，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选择历史为探讨主题。2002年，圆切线曾主办“解/构历史”的论坛，并在2003年《圆切线》第六期出版“历史众声”特辑。但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组织研讨会或闭门论坛，而是主办一整个系列的活动，最终用“逍遥游”展览呈现。这系列活动包括主办公开讲座——请华英校不同背景的韩山元先生及许黛安教授两位忆述自己的学生生活；有意识地与学校合作，并请从事研究的历史老师林增如给参与的老师和学生讲述研究方法和1945-1965的时代背景。第三，通过呼吁公众捐献文物和现身说法，而社员自己也在进行口述历史访问中接受历史教育。

圆切线的社员主要属于1960到1980之间出生的一代。对于和我们成长时期距离不远的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除了经常会见到以成语“胼手胝足”来概括和描述当时为谋求经济增长的奋发之外，大部分社员的记忆几乎是空白的。如果有一些记忆，那也是模糊的。数十年来，整个社会的专注点在解决吃饱住好的问题，我们在强调所谓“先富后教”即填饱肚子后才可能有余力谈文化艺术的思维中成长；第二，岛国是世界上少数建国者长时间占据治国舞台的地方，而把握五六十年代牵涉到如何解释现有政权的由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官方不对距离太近的去着墨，民间对距离太近的去沉默。我们念书的年代里，本地历史课本对新加坡历史的论述，几乎都随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把书本合上，我们的记忆，最突出的或许是殖民者莱佛士双臂交叠在胸前的英明神武。

这份被留白的记忆让我们开始思考和提问时，对最靠近自己的历史充满好奇。回顾过去十几年，岛国社会变化日多，但真正发挥重要影响、完整梳理往事的个人回忆著作，或许是1998和2000年分别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上下集。李光耀的书动用庞大的资源，对个人和社会参与，以及国家的大事进行系统性整理与记录。他带着权威的语气，呈现自己认定为事实的过去。这个举动本身，引起岛国内外的关注。再有，人们不论同意或不同意回忆录的内容，历史事件与观点成了公开谈议的焦点。对于岛国之成为“国”的过程、过程中参与者的角色、过程对岛国发展的影响等等，总体而言，说的人多了起来——尽管很多个人在回溯过去时，仍然会自我划定很多“能说”与“不能说”的范畴。而资料越多，越显示我们之前关心与知道得太少。

因为要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岛国需要时代背景的重量作为固定我们存在的铁锚，国家和社会为此更珍惜历史了。然而，对历史的珍视，不应只是表现在国家和社会某个人或某群人如何界定某段历史上，而是首先让人们明白，并不是只有左右时局的人物与事件才有记录的价值。个人、家庭，乃至学校、机构等等的记忆，都是最后构成一个时代里国家与社会历史大拼图的重要部分。再者，即便是回到国家政治史的讨论上，我们得问自己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们用怎样的态度去看待历史？资料的来源多元吗？为什么一些人物、事件能公开讨论，一些则不能？谁来决定能与不能？真正珍视历史的社会，最起码会尊重不同历史观点，接受争议会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出现。而了解历史的过程，让社会习惯自我反思与审视。

圆切线因而选择开始了这次探索的旅程，选择距离不远的五六十年代，寻访的对象是那个时代的中学生——华校的，还有英校的。五六十年代的华校生在官方论述中作为一个群体的形象尤其突出，与国家创建的政治历程密不可分，但是作为个人，他们的学生生活如何？当时华校生的课余生活和英校生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的各种答案曾经不受拘束地“逍遥”于主流论述之外，但除了别人的复述和我们的想象，他们的声音，我们希望亲自听到。

因为主题与学生有关，圆切线希望学生和我们一起体验。在国家开始意识到历史的价值时，年长一代也同时意识到年轻人对历史的无知。但舆论除了责怪年轻人，我们仍需要探究其原因和试图去改变现状。事实是，年轻人开始在问“为什么我们不懂？”的同时，也在表达“我们想懂”。而学校其实是个最直接引发兴趣，最容易让他们连接历史的切入点。也因为这样，尽

管资源有限，圆切线还是邀请了七所历史悠久、类型不同的学校和我们一起走这条探寻之路。新民中学的一名马来族学生 Nur Nasuha 在文章中叙述她和同学从上网无法查到学校历史资料，后来通过口述历史访问、老新民学校的手册等，考证和重新构建学校的历史。她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现在对学校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我们能参与收集整理这历史感到骄傲。而能穿上它的校服，同样感到自豪”。

不仅是学生，中正中学总校的辛淑翰老师带着学生走了这一程。我们在展览期间看到中正老师的热忱，很是感动。而辛老师也记录了自己之后的感想：“我觉得当我走在中正校园的时候，我看校园的眼睛已经不再是我自己的眼睛。我会觉得我们的湖怎么会变得这么小，因为以前中正湖很大，然后我会想以前的那棵树跑到哪里去了。我在校园中的时候，感觉上好像无时无刻有些校友在跟我对话，或者在跟那个大时代对话。所以做了这个专题之后，我对于中正的感觉不一样了，我不再只是一个过客而已，我想我曾经走到它的中间，变成它的一分子。”

圆切线鼓励学校参与时，没有设定绩效指标，没有设想参与的师生最后应该要有怎样的感悟。我们只是相信求知和了解如果是一条小径，当走到路径的另一头时，必然会看到另一番风景。学校是每天上课下课的地方，有时除了上课下课，或者因为太习惯于只是上课下课，我们失去了对学校的感觉，失去对学校的想象。我们以为知道学校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却不知道有多少在同一个校园，或者在不同校园里唱同一首歌、穿同一身校服的人，曾经怎么度过他们的学校生活；而他们的和我们的学校生活，两者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为什么存在那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让我们失去什么，得到什么。

这本书里收集了韩山元先生和许黛安教授——一个华校生与一个英校生——一起参加的论坛记录，另外还有几位五六十年代学生的访问实录。他们所谈的两个世界对建国之后成长起来的学生，是否传达某种隐约的熟悉感，或全然是陌生的？尽管时代不同，活动的内容不会再现，但是老华校生描绘的一些活动，形式上会让1979年由华校转变的特选中学的学生感到似曾相识吗？如果完全没有，那么在发展的过程中，特选中学对自己的学校传统，是否有所继承？

与此同时，克信女中毕业的许黛安教授所描绘的英校世界——譬如运动会同学分四个“舍”（house）彼此竞赛、女童军的活动等等，这些在现今学

校——不论是传统英校、邻里学校或者特选学校，应该都是普遍的。现今的学生只是参加这些活动，或者在这些活动中发挥更多的创意，但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些活动有历史可以回溯？而在韩山元先生和许黛安教授那一代属于两个世界的事，经过数十年岛国教育制度的演变，国民教育意识的加强，就在不知不觉中融成了一个世界。是其中一个世界在变革的过程中消失了？我们留意过变革的痕迹吗？一个世界的消失意味着什么？

辑二的口述历史访问中，几位受访者都谈到1954年殖民地政府要求18岁男生为服兵役登记，最终在5月13日爆发成请愿学生与警察发生严重冲突的“五一三”事件。从我们进行访问到“逍遥游”真正展出，由陈仁贵、陈国相和孔莉莎合编的《情系五一三》尚未出版。我们能够参考的资料不多。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的焦点在学生的课余活动而不只是五一三或学运，对于五一三没有专门而系统的研究。而有关这场学生运动，我们所展出的材料，包括五一三后流传的一系列冲突照片。每张照片下面都有一行图片说明。是什么人在过后制作了这样一套照片分发给学生，总共印制了多少份？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在编辑这些口述历史访问记录时，陈蒙志先生和蔡楚君女士有现场记忆，包括学生在示威抗议时怎么排队，之后怎么逃跑；李良生先生不直接参与请愿，但当时是在惹兰勿刹参加华校联合运动会的学生，他叙述了在体育场的学生听到“学生被警察打”的情状。林清如先生没有参加，但事件给了他“莫大的激荡”；陈国相先生当时仍在莱佛士书院读书，观察到英校生对五一三的反应与华校生的区别，“我曾经想在学校里面举行一次辩论会，讨论华校中学生的事情。不过，他们对这种事情，完全不关心，所以那个想法，后来也就得不到支持”。陈国相没有参加请愿活动，但就读于公教中学的弟弟事后遭学校开除，他自己跟着也去华中参加集中。同一事件，站在不同角度，面对不同情境的人有不同的回应，受到不同的影响，最终甚至可能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

尽管展览的主题是“课余活动”，但参加这些活动的“人”，才是展览和编辑这本书的重心。国大历史系的黄坚立副教授解读圆切线的展览，对当中提到的政治活动比较看重。《海峡时报》在报道时，甚至把我们的“学生活动”（student activities）直接改为“学生运动”（student activism）。实际上，圆切线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办一场纯政治性的展览。我们知道学生运动是华校学生课余活动重要的环节，但我们希望了解参加学运的学生为什么参与，怎么组织，希望了解他们怎么选择。与此同时，我们也想了解没有参加的学生、不属于学运

核心的学生怎么度过他们的求学时代。我们渴望知道“不平凡”时，一样渴望知道“平常的日子”怎么过；我们希望听当时的学生领袖的观点，也关心一般参与的“学生群众”有怎样的想法。

现在的官方论述中，“华校生”概括所有上过华校的学生，甚至成了某种标签，有时带着某种负面的意涵。我们尝试从口述历史访问中，呈现一个个受访者的思想、经历和视角。林清如先生、陈国相先生、陈蒙志先生和蔡楚君女士是学生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不过各自有不同的成长经历。陈德卿女士和李良生先生在看到《联合早报》报道我们呼吁公众捐献他们保留的物件后跟我们联络，并且详细地聊起过去。陈女士本身没有上正规的学校，却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学生的社会参与——她的先生在读书时曾到小商公会的识字班任教。李良生先生因为家境的困苦，在动荡的时代里，选择做一个旁观者——相信这在当时不会是少数。蔡向荣先生比前面几位受访者稍晚出生，因为爱好绘画，忆述学生时代学画、办展览的过程，也为我们补上一课。他们做了不同的选择，或者被迫选择了后来的路径，但是从弱勢的华校生的际遇里，我们看到时代洪流对个人的冲击几乎无所不在，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某种共同的印记。

五六十年代学生活动中，1955年成立的全新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中学联）生命极短，对岛国建国历史影响有多大，有待历史学者评定。林清如先生把这个重要的学生组织的成立背景、经过、组织、发展和最后的解散，做了详细的记录。我们因此请他借予圆切线在书中发表。陈国相先生的访问录，原来是为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南大口述历史访问系列所作，中心主任李元瑾老师将其中陈先生谈中学生生活部分特别借予我们使用，也让《逍遥游》得以展示一个由英校转华校的学生们的特殊经验与观点。

因为人力单薄，圆切线访问的对象非常有限。此外，我们意识到口述历史访问录也局限在华校生。念中学的英校生不关心时政是不是一般人的刻板印象？英校生课余做些什么，是我们在策划展览时原有的问题，也因此我们筹办第一次论坛，同时邀请了许黛安教授主讲。除了许教授，我们翻阅了一些传统英校的校刊、校友的出版物，也尝试跟英校生联系访问。不少英校生活跃于体育项目，也有英校生谈及对流行文化的兴趣。林福寿医生当时对中学生生活轻描淡写。他说，校方要求学生以学业为重，因此他是到上了大学后才活跃起来。然而，整体上对英校生的资料收集太少，确实是我们另一不足之处。

“逍遥游”展览举行后五年才出版本书包含的这些内容，圆切线大概让读者久等了。不过这五年来，岛国在追寻历史方面的活动多元多彩，例如在2008年底，20多所新马华校校友即联合主办了华校校史联合展；以及2010年的华艺术节举行“戏聚现场”展览，回顾新加坡华语剧场的发展历程，其中学校的戏剧学会是早年岛国戏剧活动的中流砥柱。上面提到2011年出版的《情系五一三》，新书发布的座谈会上座无虚席。而去年底，正当我们开始做《逍遥游》的校对时，由几位华校高中生在1954年发起的康乐音乐研究会则出版了《历史的跫音》，为我们留下重要的历史材料。这些一起探寻岛国历史的努力，丰富了我们的，也催促我们不得不把“逍遥游”展览的资料整理出版。

把五六十年代的这些片段拼凑在一起，对我而言，不单是尝试接近历史原貌的过程。从这些当年要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中学生身上，我看到的是岛国至今最丰美壮观而难以复原的历程。尽管物质条件匮乏，制度缺漏，秩序紊乱，但是当时在众人的“胼手胝足”之间，闪耀的是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社会学系的郭建文副教授在参加2007年11月“逍遥游”的同名论坛时指出：“一个没有理想主义的社会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对我们而言，理想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而且也可以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呢？能够去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不同的世界，这就是‘理想化’的本质。……1945年到1965年是新加坡历史中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当时很多年轻人被迫去想象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圆切线在整理成展览的不同区块时，发现不论是反黄运动也好，或者是学生自发学习马来文，又或者是五一三示威照片里面，背后都有一份对未来的想象和期盼。为了这份想象和期盼，这些中学生付出了焕发的青春。

岛国有过的这些理想主义，圆切线希望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我们需要知道，需要正视，而且应该铭记。